

农民工高等教育 需求、供给和 认证制度研究

李明华 著

Nongmingong Gaodeng Jiaoyu
Xuqiu Gongji He Renzhengzhidu Yanjiu

中国言实出版社



需求、供给和 认证制度研究

李明华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李明华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 - 7 - 80250 - 682 - 4

I. ①农…

II. ①李…

III. ①民工—农民教育: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725. 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95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24735(邮 购)

64924880(总编室) 64890042(三编部)

网 址:www. zgyscs. cn

E-mail: zgyscs@ 263. 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6 印张

字 数 384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 - 7 - 80250 - 682 - 4/G · 153

谨以此书献给千千万万个外来务工兄弟姐妹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70973036)《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社会选择和效率理论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建立在如下基金项目的基础之上:

福特基金会项目(项目编号 1055 -0993)

华东师范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编号:79003004)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05JA880013)

在此一并鸣谢!

前言

一、本书的由来

我于1988年离开上海去美国读博士,以后在美国工作多年,2003年9月又回到上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任副教授,现就职于该校公共管理学院的教育经济研究所。回国后发现,上海与我15年前离开时的最大区别是,到处都有外来务工人员。于是,我开始在马路上与他们闲聊,慢慢地对他们产生了兴趣。终于在2004年的一天,我决定致力于农民工的教育事业。有不少同事和学界人士不解,提出疑问: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博士,出国前曾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讲师,怎么研究起农民工教育来了,这有学术含量吗?然而,我依旧我行我素,居然一干就是七八年,开始了众学者看不起的研究历程。

2004年,我见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曾满超教授,我与他谈了我对农民工教育的看法和想做这方面研究的设想。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项目,既有学术价值,又能惠及农民工这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他建议我与北大教育学院的学者合作做这个项目,找福特基金会寻求资助。很快,我就到北京去了一次,在曾教授的安排下与北大的丁小浩教授一拍即合,决定组建一个由华东师大、北大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共同参与的农民工教育研究团队。我为项目负责人,负责这个项目和华东师大团队的运作,丁教授负责北大的运作;闵维方教授是北大的领导,也是我斯坦福大学同一导师的师兄,也参加我们的团队。在项目的运行过程中,闵教授给予了很多有意义的帮助和指导,甚至还亲自在“北大平民学校”以志愿者的身份给农民工上了一堂课。因为福特基金会的坚持,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最后不能作为项目的一方参与,而是由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后来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 Henry Levin 教授和曾满超教授作为项目顾问参加我们的项目。

项目实施分为两个团队,两个团队既有共同的项目宗旨,又基本上分别独立运行。一个团队是由丁教授领导的北大团队,一个是由我领导的华东师大团队。这种分别独立运行的好处是鼓励创新,各自为自己的活动负责和享有声誉,于是两个团队都具有做项目的内在动力,结果非常成功。

北大团队举办了“北大平民学校”,为本校的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北大向农民工提供免费教育发展服务表明,中国知识界最负盛名的学府开始向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伸出教育的援手,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2007年,“北大平民学校”的创举获得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中国很多高校雇用的农民工在千人以上,如果每个大学都为他们自己雇用的农民工提供教育服务,然后再辐射周边的农民工,那么,这种模式很可能成为大学周边城区解决农民工教育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模式,可以惠及几百万人。

本书则是以华东师大团队的项目运行为基础,研究处于城里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盲区的工业区农民工教育。项目主要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并在运行过程中还得到了国内有关项目资助。

当时,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项目官员何进博士是我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校友。与何博士打交道是快乐、艰辛和有成就的。快乐是因为他与我分享了他长期做项目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们共同做项目的理念。他提倡做项目要“创新、参与、可持续、实事求是”,这也是我认同并且身体力行的。艰辛是因为他做事一丝不苟,即使是同学,他也坚持标准。申请项目的申报过程持续了10个多月,最后成功的是2005年6月27日的第9稿项目申请书。成就是因为我吸收了他做项目的经验和亲历亲为的作风。经过3年的辛劳总算敢说,我们在农民工教育方面研发出有创新的、可持续的、希望能基本覆盖工业区农民工的办学模式:建立遍及工业区的以学习中心为基点的社区性开放大学。项目完成以后,我每年都要给何进博士写一个邮件,表示对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感谢,特别是对他个人对我们项目贡献的感谢。

项目从2005年8月开始到2008年底结束,历时3年半。我们华东师大

团队参与的教师有：文剑斌、刘德恩、白芸、刘海波、张万朋、刘莉莉、葛大汇、宋锦洲、石宜君、陈宜君、唐宗清、方哲和雷秀峰。当时教育管理学院院长陈玉琨，教育管理系主任陈永明和学院金任芳书记都对项目运行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华东师范大学罗国振副书记、王小明副校长也听过项目汇报，并给予大力关心和帮助。学生团队成员由于新学生的到来和老学生的毕业而前后有所变化。在预研究和项目的前期阶段主要有王健、杨东、吴慧燕、周翠萍、吴艳艳、陈耀、徐燕雯、姚慧珍、徐晶、李绯、郑春光、李冰凌等 10 多位学生。在项目的主体运行中参与约有两年或以上的学生有：王炎蔚、王亮、李会娟和罗艺，他们为调研和教育实验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大将”级别的贡献。其他参与几个月以上到一年的学生有：朱海雅、刘政昌、孙慧、沈丽丽、黄自敏、董有志、姚卿、栗平、韩学勤、赵刚、孟娜、袁艳敏、王斌等。其中以农民工教育为题写硕士毕业论文的有：王亮、李会娟、罗艺、朱海雅、刘政昌、栗平；以农民工教育为题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有：吴艳艳和黄自敏。我们还外聘了一些运行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农民工教育实验的兼职教师，他们工作的时间从几个月到一年多不等。他们是：徐延明、邓集林、陆雅婷、邓斌、陈莹、徐丽娜、李敏、陈华影、汪华辉、戴奇云。此外，还有众多校外人士和实验合作单位的人员，参与了座谈会、咨询、实验、授课，等等。最重要的还有农民工本人的参与，他们以参加实验课程、访谈和参与实验方案及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对项目的运行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在此，对以上各位以及遗漏的对项目有贡献的人员，我谨致衷心的感谢！

2008 年底，我们在调研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工业区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办学模式是建立遍及工业区每一个农民工聚居点以学习中心为基点的社区性开放大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开放大学系统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内，难以大规模地为农民工提供有学历的成人高等教育。于是就需要解决一个如何认证高等教育机构，谁有资格举办颁发学历文凭的教育项目的问题。当提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机遇早就来了。

2007 年盛夏的一天，陈玉琨院长邀请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985 工程”第二期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

“教师教育评价与管理制度创新”项目。陈院长将该项目分为8个子项目,其中一个“教师教育评价与管理制度的国际比较”,由我负责。于是我就无意中开始了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研究。该研究历时约一年半,到2009年初结项,由我和我的两个研究生黄自敏、董有志组成的子项目组提交了标题为“高等教育和教师教育认证制度的主要国际模式”的研究报告。由此引发我对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研究的兴趣。2009年初,我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团队,成员有我所在学院的教师葛大汇、邱伟华、刘海波和华东师大MPA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红岩,以及若干研究生。我们在该研究的基础上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社会选择和效率理论研究”并在当年获得了资助。本研究的成果填补了2005年以来我们做农民工教育研究的缺项,这反映在本书的第四篇“创新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建立农民工教育秩序”中的五个章节。这样,使我们对农民工教育的研究具有崭新的意义,研究变成对中国未来成人高等教育市场的研究,而以认证制度的研究为其制高点。

二、本书的理论体系

农民工教育是一种“消费”过程中对不同的独立主体产生效用,并在同一个过程中让他们都获得某种满足的产品。这是处于同一个东西有不同的主体在同时“消费”的产品的市场。笔者则把教育归入典型的私人产品的范畴,因而不得不跳出传统的公共产品的研究范式,尝试运用经典的需求和供给的市场研究视角来对这种“消费”过程有不同的享用主体的产品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农民工教育这个具体的产品上展开。

一个产品的同一“消费”过程有不同的独立主体来享用的需求和供给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增加了研究维度。本书把农民工教育这种产品的独立享用主体基本归结为农民工个人、企业、社区和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总体,分别研究了他们对同一产品的利益(需要)。为此,产品的付费结构也极其复杂而又有研究价值。农民工是他们教育费用的第一付费责任人,企业和社区为第二责任人,而政府则是第三责任人。如果第一责任人的私人购买水平

不但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且也使其他主体的需要也得到满足,那其他主体就是理所当然的搭便车者,这就是“免费的公共大餐”。但是,政府是最后的“守夜人”,如果私人市场失败,如同现在的农民工教育市场,则政府就必须介入购买,以实现农民工教育上的公共利益极大化。

在供给方面,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把供给方看成独立于需求方的主体,但在教育这个有多方需求主体的产品的供给方面,迄今为止,自给自足模式仍占主体。国家作为教育的公共需求者代表,往往也是教育的供给者。如果购买者和供给者是同一体,则市场是不存在的,一切市场所能带来的诸如竞争和效率的利益都是不存在的。本书在理论上论证了同一个产品的供应可以分离为若干主体,他们的有机组合使得各路需求者在介入供给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时又使得最终的供给者可以与需求者是不同的主体,从而形成对最终的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主体分离,教育产品就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跨入市场经济。在农民工教育市场上就是,学习中心为基点的社区性开放大学的物质资本等基础设施与教育项目供给者的分离;前者可以是国家、社区和企业等合作或分别建立,而后者可以是任何学校、培训机构、有资格的教育家个人。由此形成有效率的、对农民工全覆盖的教育供给体系。

本书构建的市场理论框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传统的基本市场结构的重构。依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供给和需求是分析市场的基本元素,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完整的市场构造。萨缪尔森就曾经风趣地说,一个鹦鹉只要会说“供给”和“需求”那两个词,就是个经济学家。本书提出了一个“买家有效时间内获得‘真相’不可能的经验定理”,买家,特别是消费者,无法知道所需要购买的物品的某些重要部分,对其缺乏识别力,从而或者是退出市场,或者就是盲目购买。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于专家对产品的检测意见。可以说,对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产品的质量判断都必须依赖专家检测。这些专家的检测结果就是对所检测产品的认证。今天仅仅研究供给和需求是难以理解市场行为了。于是,一个基本的市场除了供给方和需求方以外,还要加上个交易产品的质量认证方。市场的基本模式从买-卖双方构成,演化为买-认证-卖的三方构成,这是我们的市场理论的基本点。从这个基本点出发,

形成了全新的市场理论。但是,从买-认证-卖的三方构成的基本市场模式来看,认证市场本身也是由买-认证-卖的三方构成的。假设消费者为认证的买方,消费品认证机构为认证服务的卖方。消费者与认证机构间难道就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由此就产生了对认证的认证的需要,即对消费者对认证的直接需要和供给也需要这样一个基本的市场模式:消费者对认证的需求-对认证的认证-对消费者的认证供给。这种认证的认证可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直到谁都无法承受其成本,而认证却变得越来越无人相信。由此发现,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基本模式是可能非常低效率的。这种低效率不是偶然状态,而是市场的本质特性。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认证体系,今天的市场在本质上是低效率的。

教育市场上“买家有效时间内获得‘真相’不可能的经验定理”是更为明显,最严重的就是“文凭工厂”,常见的则是专业、课程、教师和就业市场的信息误导。于是,对教育市场的研究必然不可能脱离对教育市场的重构,对教育认证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书的基本理论体系架构是,农民工高等教育是一种“消费”过程满足农民工、企业、社区和国家等独立主体的需要的产品,其需求的多维度决定其买家构成的多维度;学习中心为基点的社区性开放大学的物质资本等基础设施与教育项目供给者的分离,使教育的供给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教育市场发展的“史前”时代;教育市场重构,建立有效率的农民工高等教育认证体系。

本书仅仅是以农民工的高等教育需求为例来运用这个教育市场理论的分析框架,期望这个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多的教育市场研究,特别是对传统的高等教育市场和基础教育的研究;在关注中国教育市场研究的同时,还需要放眼其他国家的教育市场研究。

三、本书的篇章导读

根据以上对教育市场的重新建构,教育市场的最基本结构必须是买-

认证-卖等三方组成。于是就有本书的前四篇。第一篇“农民工教育的私人需求”和第二篇“农民工教育的公共需要”共8章,研究对农民工教育市场的“买家”的需求。

第一章“农民工的人生万花筒”让您在阅读过程中好像就是在和农民工访谈,听到他们对教育需求的呼唤。

第二章“新生代农民工将是中国非传统高等教育的生源主力”提出“高中后高等教育需求规律”,而新加入的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比重愈来愈大。可以预期,要不了多久,新加入的农民工将会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群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终身学习能力和习性的形成,他们的巨大数量和持续增长形成了中国大专层次非传统高等教育的基本生源。这是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市场发展的最大的变数之一。

第三章“农民工多层次、多类别和多种学习形式的教育需求”提供相关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工需要一种包含内容非常广泛的教育和培训来实现自我和职业发展,这至少包括:成人补习教育;既有通识性教育,又有技能和职业教育;既有娱乐休闲教育,又有学历和证书的“严肃”教育;涉及各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的高等教育,而又以技术和大专学历的结合为主的开放大学式教育。可以预期的是,将来在农民工教育市场上,传统的教学方式,纯网络的和混合式的都会有市场,而以网络 and 面授的混合式为主流市场。

第四章“农民工教育市场估计和市场细分”也是以调研数据为依据,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愿意为自己的继续教育埋单,以2006年的数据估计,上海市农民工人均购买继续教育的意愿是700元,上海市农民工继续教育市场估计是21亿元。细分市场研究表明,三资企业工厂工人/技工人均每年愿意支付的继续教育学费为1058元,远高于上海市的平均数。农民工教育市场巨大,而又以工业区,特别是三资企业工业区的农民工教育市场最适合于大规模开发。于是,我们把研究和实验指向现代工业区的新生代农民工。

第五章“需要培育的农民工教育市场”是根据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的观察,发现问卷调查所获结果与农民工的实际教育参与的巨大离差,发现农民工市场并非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而是一个需要培育过程的市场。这解释

了为什么农民工表示有教育需求,而事实上又很少有教育供给的矛盾。这表明,农民工市场的培育需要国家的介入。

第六章“教育的效用、需要和公共产品的原理”开始转入农民工教育的公共需求研究。教育产品的效用有,私人(直接)效用和公共(外部)效用。根据公共产品的概念,教育是典型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长期以来称教育为公共产品的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由于教育的公共(外部)效用极大,国家(公共社会)要采取行动来确定教育产品使得公共效用极大化。但是,这并不是国家介入教育的必然理由。例如,只有当国家介入教育的边际公共效用大于由此投入的公共财政,国家买教育才是合理的。如果私人购买教育达到教育的边际公共效用等于零的地步,这时教育的公共效用总量最大,而这恰恰是国家不必为教育付1分钱的状态。由此,国家今天需要为农民工教育投入经费,就是需要培育这个教育市场,以便有朝一日农民工教育也将基本变为“免费的公共大餐”。

第七章“新国富论:农民工教育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国富源泉”是关于农民工教育的公共效用。本章提出一个容纳分析知识经济特点的“教育生产力的统一模型”,突出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是国富的本源,中国的富强依赖于将占城镇劳动力半壁江山的农民工和几亿乡村、山村和小镇人民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本章的一个亮点是“农民工的财富经济学”,农民工作为一个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结构联系起来的基准,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对应的农民工劳动的国际价值是中国非国际贸易资产的国际价值的基准。因此,农民工的教育提升他们劳动的国际价值,同时经由国内的价格机制导致国内各类资产如土地,各类非国际贸易的生产要素如大学教师的劳动的国际价值的上升。于是,农民工教育牵动中国的资产的整体国际价值的上升。

第八章“制造业农民工聚居区的新社会结构与社会合作”试图用工业区的新型社会结构来解释农民工教育缺失和弥补之道。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是由新型的三大社会阶层构成: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工人阶层,以工厂主及其管理层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所有者阶层,以工业区的土地所有者和实际控制者

为代表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目前的教育发展的缺失是因为这三大社会阶层对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的迷茫,形成短期行为,农民工在工厂和社区都仅仅是临时过客,因此就不会有代表社会发展的教育事业。解决之道在于正视新的社会结构,促进阶层合作,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和谐共处,从而才会共同发展教育事业。本章的核心思想是,工业区三大阶层合作共同发展社区性教育,有助于当地建设和谐社会,因而也是基本的国家利益。

第三篇“农民工教育供给模式搜寻、设计和实验”共8章,是对农民工教育市场“卖家”的研究。

第九章“农民工与现有成人教育体系的分离”把阻碍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因素概括为:“时间、信息、空间、资金、项目”。就是这些因素把农民工与现有的成人教育体系分割开来,使得有继续教育需求的农民工事实上得不到现有成人教育体系的教育供给服务。

接下来的三章是我们搜寻“他山之石”的结果。第十章“深圳农民工教育办学模式创新经验——教育行政无能为力的成就”介绍了三个深圳的经验:一个是深圳书城培训中心农民工教育经验和办学模式;第二个是深圳大学成教院农民工教育经验;第三个是深圳福永街道成人学校案例。第十一章介绍了美国社区大学改革为弱势群体提供成人教育的经验。第十二章介绍了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为弱势群体提供成人教育的经验。

第十三章提出工业区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渠道模式:以学习中心为基点的社区性开放大学网络。文中提出工业区农民工继续教育供给的全覆盖的概念。以农民工教育全覆盖的标准来衡量,所谓解决农民工教育问题就是要基本达到,潜在的农民工学员在继续教育覆盖的“时间、信息、空间、资金、项目”这5大因素的交集的比重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例如70%—80%以上。为了解决“空间”问题,需要在有几千到几万人的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建立学习中心,配备必要的学习设施。若干个学习中心组成学习中心群,可以通过小巴士串联起来,可能一个学习中心群跨越的人口是10万人左右。学习中心群实质上就是一个分布式校园,是由一个个散布在一个区域内的、若干个居民集中点的学习中心构成的,由小巴士串连起来的一个校园。一个

学习中心群就是建一个社区学院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应该是开放的,使得其他教育机构也可以使用这个学习中心群的教育设施提供他们的教育项目。因此,我们称这样的学校为社区型开放大学。

第十四章论述了农民工聚居区利益相关主体“协商”共建社区大学和分担教育成本的理论,并报告了我们在2006年按照这个理论的一次实验。我们实验的基本思路是,如果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农民工发生继续教育“市场失败”,能否通过推动“协商”使第二责任人,即当地政府和企业采用“成本分担模式”来矫正第一责任人的“市场失败”?“协商”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理论上没有一个均衡解。遗憾的是,我们的这次实验失败了。其实,“协商”成本有时是很大的。作为第三责任人的中央和省市级别的政府的介入,有农民工教育的国家战略,是解决农民工教育问题的根本保障。

第十五章“向严密的教学组织要学习效率”介绍了第十四章介绍的同一次实验,但却是从农民工学习及其学习组织的建造角度介绍该实验。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实验。本章从学习组织的理论和创新的角度设计农民工利用互联网建立互助的学习社会支持系统,并在实验中观察这个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该实验使我们相信,学习的社会互助系统是农民工有效率、可持续学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农民工教育市场培育的低成本途径。农民工教育的成功密码就是这个互助的学习系统。

第十六章提出把网吧变成学习中心将使工业区获得初始的全覆盖的教育基础设施的理论,从而使那些早已渗透到工业区各个角落的网吧也兼有为各路教育机构提供下伸办学点的功能。

第四篇“创新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建立农民工教育秩序”等5章是对农民工教育市场的基本结构组成部分“认证”的研究。由此完成了以农民工教育市场为例的对具有新的基本结构的教育市场的研究。

第十七章“学习成就的社会认可和当前的制度困境”从理论上阐述了农民工学习也同其他人学习一样需要社会认可的原理。农民工学习的一大目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文凭证书是对他们的人力资本的“认证”,缺乏了这个认证,农民工通过继续学习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就会在一个买-认证-卖

构成的人力资本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就不被市场认可。本章还提出了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效率高低的判断依据:第一,必须名实相符;第二,名的多样性适应实的多样性的需求;第三,名的数量达到实的数量。

第十八章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度量学习成就和不同学校获得的学习成就如何换算的问题。理论和实务界都把学习等级和学习成就混淆了。通常人们把学士、硕士和博士等看成是学习成就,其实,这些学位代表的仅仅是学习等级。学习等级的度量衡是学习的时间,例如,本科学位,代表的仅仅是高中后4年的系统学习。不同类的学校间学分互认如何折算是很难按照关于学分所代表的知识和技能的度量来实现的。相反,这种折算是建立在学校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是积累了其他大学转学来的学生的学术表现而定的。根据这种经验,不同类型的大学自然就形成一个学分转换率。如果把他们系统地公示,就可以形成一个“市场化”的不同类别学校间学分互换的置换率。这种置换率是条件置换率,仅仅适用于有资格获得转学者,而不是一般的学校间的学分转换率。这种条件置换率是不可能由一个行政机构通过计算来实现的。由此,不可能由一个机构来替代市场来科学地形成不同学校间的学分互认的置换率。

第十九章“教育资历信号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分层认证”把认证的需要归结为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本章提出一个“买家有效时间内获得‘真相’不可能的经验定理”,“反馈环线有效周期”过长,或成本过高就使得消费者不得不“闭了眼睛”买,或干脆就排除了许多本来可以存在的交易。今天社会选择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市场的基本结构从买-卖转化为买-认证-卖。认证有好坏之分,一个坏的认证制度不但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问题,反而会添乱,创造寻租的机会,使得交易成本比没有这种认证制度时还要高。本科文凭是个“名”,代表的是完成大学4年这个教育等级的“实”。如果政府认为发放本科文凭这个“标签”特别神圣,而实际上却容忍本科教育的“实”的质量下降,那就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别人用其他的“名”来代表更高质量本科教育之“实”。对于一个“高中后4年高等教育”之“实”,教育部可以给个“标签”叫本科学历,那别人也可以给个“标签”叫A学历。

只要社会通过一个充分的“反馈环线”,A 学历这个民间机构给的“标签”当然会反映“高中后 4 年高等教育”之“真相”。一个有效率的认证体系必须是,公布的认证结果的唯一依据是“真相”,成本要低,提供的信号足以反映分层的市场质量等级,而又不会等级太多使得信号出现“云雾”遮蔽。农民工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大的分层,需要对他们相当于“高中后 2 年高等教育”和“高中后 4 年高等教育”的教育等级给予“标签”,以便农民工在完成了某个等级的高等教育以后获得对应的信号。

第二十章是“教育供给者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分离——教育家的解放与学习者的自由”提出一个大众化的办学模式,有三个最基本的组织:一个是学校物质设施及其服务的供给者,简称为“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第二个就是提供教育项目的组织,可以是教育家个人或他们的自由联合;第三个是在校园内部的教育市场管理机构。大学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分离,使得合格的教育家个人或他们的自由联合体可以自由地通过租借或其他办法获得使用大学的物质资本来自由地办学。从此,教育家办学就不再受制于资本。由于办学者的竞争,学生获得充分的教育项目和课程选择的自由。经过一定的程序认定为合格的教育家应该可以做学历教育独立导师。本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后的预测是,网络发展导致的教务管理的自动化必然使得大学这个教学组织用市场替代大学内部的管理。对于农民工教育市场而言,这个“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就是遍及农民工聚居区的学习中心、学习中心群以及其他教育设施。于是,农民工教育的供给者可以多元化,包括教育家个人。

第二十一章是“新式高等教育认证制度保障下农民工学历教育秩序”。农民工高等教育市场很大,其本身就有多个分层,有水平的高低,风格的区别,学习方式的不同,还有教育供给者的不同,有电大,有自学高考,也有在新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下的其他类型的覆盖农民工主体教育市场的以学习中心为基点的社区性开放大学。这就需要有一个服务于农民工高等教育的认证体系。农民工高等教育的认证体系的顶端需要一个元认证,可以是政府组建的,依据政府的需求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另一个是由被认证的认证